

延续与创新——帕特里克·格迪斯与特拉维夫城市规划

Continuation and Innovation: Patrick Geddes and Tel Aviv Urban Planning

李楠 李百浩
LI Nan, LI Baihao

摘要：特拉维夫是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希伯来城市，是国际规划史研究的独特案例。20 世纪早期为特拉维夫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不仅是英国城市规划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唯一整体付诸实施的城市规划构想，也是特拉维夫“白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核心因素，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笔者梳理了特拉维夫早期规划史进程，从区域研究与城市定位、地块划分与总体布局、道路规划与街区管控三个方面论述了格迪斯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创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阐释了格迪斯方案的独特性内涵。笔者认为：延续历史与创新探索并非泾渭分明的对立概念，可将二者并行不悖地融会贯通在城市规划方案之中；格迪斯既是特拉维夫历次城市规划实践的继承者，更是将城市规划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开拓者。溯源格迪斯城市规划思想的精髓所在，对于今天的城市规划实践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反思价值。

Abstract: Tel Aviv is the first modern Hebrew city in the world, which has significant valu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urban planning history study. As the only implemented urban planning scheme made by British planner Patrick Geddes, and the key factor that Tel Aviv “White City” was listed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Geddes Plan of Tel Aviv in the early 20 century is worthy of research.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process of Tel Aviv’s early modern planning history, discusses the contents and innovative ideas of Geddes Plan from three aspects: regional research and urban orientation, land division and general layout, road system and block planning.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unique connotations of Geddes Plan. It finds that continuation and innovation are not distinct opposing concepts, which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urban planning scheme; Geddes is not only the successor of Tel Aviv’s previous urban planning, but also a great pioneer of modernist urban planning.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racing back to the essence of Geddes Plan is still has positive references value for today’s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关键词：外国城市规划史；帕特里克·格迪斯；特拉维夫；希伯来城市；现代城市规划

Keywords: Foreign Urban Planning History; Patrick Geddes; Tel Aviv; Hebrew City; Modern Urban Planning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4BZS067)，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 (KYCX21-0148)

引言

2003 年，作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与建筑实践的杰出代表，位于特拉维夫城市中心的“白城”地区入选世界遗产名录^①，成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现代城市遗产项目之一。横向对比，特拉维夫与巴西利亚等其他现代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以色列特殊的国家、民族以及地缘背景相互交织在一起，发酵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与挑战，由此塑造了其独具特色的城市规划内涵，为拓展早期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认识深度和理解广度提供了一份典型案例。

尽管特拉维夫的城市规划实践曾经深受自身特殊背景的深刻影响，然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论在任何时代，不论面对任何一座城市，规划者都应该将特定的地域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制定城市规划决策的重要基础。就此而言，在洞察和理解城市规划与地方身份认同的相互作用方面，特拉维夫也是极具参考价值和反思意义的研究对象。

作者：李楠，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nanlivictoria@163.com

李百浩（通信作者），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libaihaowh@sina.com

① 2003 年，特拉维夫白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官方名称为 White City of Tel Aviv-the Modern Movement，遗产核心保护区面积 140.4 hm²，缓冲保护区面积 197 hm²。以格迪斯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为基础，特拉维夫白城形成至今尚未到百年时间，是最“年轻”的世界遗产之一。

1925年,英国城市规划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①(Patrick Geddes,亦有译为帕特里克·盖迪斯)制定的特拉维夫城市规划方案(下称“格迪斯方案”)为这座城市赋予了最初的城市特性,使之具备了城市发展的框架基础,从而见证了城市规划建构现代城市的历史性创造价值。从今天的视角看,格迪斯方案早已成为“过去式”,但与之相关的学术探讨一直延续至今,众多学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规划知识积累^[1-5],从这个意义上说,格迪斯方案为国际规划史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检索文献资料发现,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研究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格迪斯的学术思想并未受到国内学界除金元、李浩等少数学者^[6-7]的过多关注。至于其唯一整体付诸实施的规划成果“格迪斯方案”的专题研究更为鲜见,可谓一处极大的研究空缺。进一步放大检索范围,在特拉维夫规划史方面,目前仅有的少量成果仍以译著为主^[8-9],虽然其中对格迪斯方案多有涉及,但与之相关的研究内容所占比例相对较少。此外,其他零星成果主要来自历史学科^[10-11],研究内容多着眼于相对宽泛的城市史而非规划史视角。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格迪斯方案尚未被国内学界充分还原和讨论。

综上所述,适逢2024年格迪斯诞辰170周年,重新审视格迪斯的规划遗产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充实格迪斯方案的历史图景,使之得到更深入、更生动的呈现;二是有助于探究格迪斯席履丰厚的城市规划思想及其人文内涵,以此拓展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理解深度;三是从格迪斯方案中汲取有益于规划史研究的启发价值,从而为跨越时空限定的城市规划认识论提供一份值得学习借鉴的史料参考。

1 特拉维夫早期规划史梳理

在规划界,格迪斯被公认为现代城市规划早期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其经典著作《进化中的城市》及其主张建立的以“调查—分析—规划”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体系等学术思想,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实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尽

管历史成就斐然,但由于种种原因,格迪斯一生中创作的大量城市规划方案极少被付诸实践,作为唯一整体实施的规划作品^[12],为特拉维夫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无疑是解读格迪斯城市规划思想最为重要的一手史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拉维夫由地中海港口城市雅法郊外的犹太移民定居点发展而来^[13],是以色列规划建设的第一座希伯来城市^[14]②。结合文献史料对城市发展历史进行归纳梳理,就格迪斯方案本身及其之前的城市形成过程而言,特拉维夫总体上经历了定居点建设、设市建制、格迪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三个主要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特拉维夫早期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从中能够窥见格迪斯方案的脉络背景与历史基础。

1.1 定居点建设与规划起点

20世纪初的雅法城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长期混居在一起,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导致社会环境长期动荡不安。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散居在雅法各地的犹太裔中产阶级居民于1906年联合成立了阿胡扎特·巴伊特协会(Ahuzat Bayit)^[15],开始在雅法郊区大规模购买土地,为建设专属犹太人的独立社区作前期准备。时隔3年,阿胡扎特·巴伊特社区正式奠基动工,特拉维夫拉开了城市建设的历史序幕。

为了在健康环境中建起一座全新的希伯来社区,犹太裔建筑师斯蒂斯尼(Wilhelm Stiassny)于1909年起草编制了《关于雅法阿胡扎特·巴伊特协会建立城市定居点的规划》。在这份规划书中,斯蒂斯尼不仅首次提出“城市在花园中”(a city within gardens)的总体指导思想,而且明确指出新的定居点应根据城市规划的科学准则,结合现代卫生和审美原则,在充分考虑当地自然特点与气候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建设。

较为充足的土地储备是定居点开发建设的关键基础^[16]。斯蒂斯尼规划方案出台当年,50栋居民住宅以及自来水厂、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就被迅速建设了起来^[15]。今天看来,在格迪斯之前,经过10余年的大力建设,特拉维夫的住宅、街道、基础设施已经颇具规模。对于任何城市规划工作来说,

① 帕特里克·格迪斯1854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巴勒特市(Ballater),1874—1878年就读于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师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赫胥黎(Thomas Huxley)进行生物学专业训练。1880年起,格迪斯先后在爱丁堡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任教。在此期间,格迪斯逐渐将精力转向了组织开展社会活动,如成立爱丁堡社会联合会,致力于改善贫民窟环境等。这一时期,开展城市调查研究、组织城市规划展览、参与城市规划实践日渐成为格迪斯的工作重心。1915年,格迪斯的经典著作《进化中的城市》出版发行。1915—1924年,格迪斯远赴印度等地进行了大量城市调查研究和规划编制工作(大都未获实施)。1919年,格迪斯访问耶路撒冷,完成了希伯来大学规划方案(未被采用)。1925年,格迪斯受邀为特拉维夫编制城市规划方案(获得实施)。1932年,格迪斯在法国逝世;同年,格迪斯被英国授予爵士荣誉头衔,以表彰其对于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

② 源于对希伯来文化与犹太复国主义历史意义的认识,在特拉维夫城市规划方案中,格迪斯将现代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通过城市规划展现新的希伯来文化内涵,特拉维夫由此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希伯来城市,其中不仅表达了犹太人复兴古希伯来文明的理想愿景,也暗示了以特拉维夫为起点建设犹太主权国家的民族诉求。

这样的建设力度都是不得不作出充分考虑的现实因素。可以肯定的是,特拉维夫早期定居点奠定的建设基础(图1),加之斯蒂斯尼提出的花园城市规划意向,对格迪斯方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2 设市建制与规划调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成为英属托管地。1921年,由英国委任的托管政府采取行政分治政策,授予特拉维夫自治城镇的独立地位和单独编制规划的行政权力^[17]。获得自治权以后,特拉维夫与“母城”雅法的隶属关系倏然改变,全新的城市规划愿景浮出水面,即寻找特拉维夫作为独立城市的可行性建设方案。

成为自治市以后,任职托管政府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的考夫曼(Richard Kaufmann)和建筑师移民申菲尔德(Leo Leob Sheinfeld)等相继开展了特拉维夫土地勘测与规划编制工作^[18]。其中,自1921年起,考夫曼不仅为特拉维夫制定了多个分区发展规划,而且汇总整理了犹太居民购买的土地资源,为其绘制了整体性城市发展蓝图(图2)。虽然该方案最终未

被政府采纳,但考夫曼翔实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在特拉维夫城市规划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从规划方案完善程度的历史关系推演来看,格迪斯方案可谓是考夫曼方案的进一步拓展。思考二者差别的个中缘由,与职业建筑师考夫曼相比,格迪斯在教育背景、知识广度、社会履历等各个方面对于城市规划综合性内涵的理解都更加宽广丰厚,这使得格迪斯不仅在考夫曼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了规划视野,而且形成了更为体系化的规划思路 and 更具适应性的规划方法。

1.3 格迪斯方案的制定实施及其历史影响

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早期,方兴未艾的锡安主义(Zionism)^①和多次阿利亚(Aliyah)运动^②为占据地理优势的特拉维夫地区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大量犹太移民。1920—1925年,特拉维夫的居住人口从2100人猛增至3.42万人^[19],导致住房、公共设施建设压力倍增。在设市初期,虽然特拉维夫名义上获得独立地位,但实质上其仍然对雅法有着极高的依赖度。由于巴勒斯坦自然资源十分匮乏,为了争夺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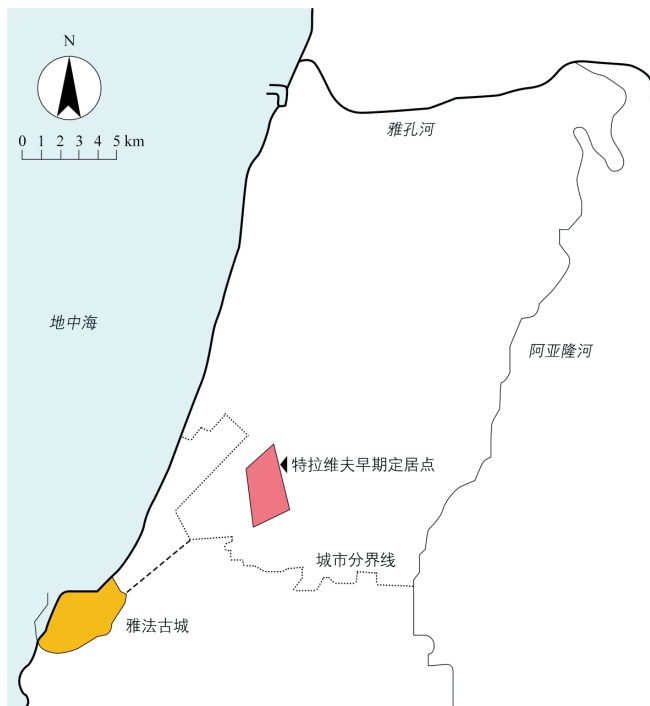


图1 特拉维夫20世纪早期定居点选址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6]绘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

① 锡安主义是国际社会惯用的政治术语,代表了犹太人对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山锡安山的崇敬与向往,蕴含了对共同民族理想,特别是犹太复国理想的强烈追求,体现了犹太人对希伯来文化的继承发扬精神。

② 阿利亚运动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犹太人从欧洲各地移居巴勒斯坦地区的多次大规模移民行动。阿利亚运动促进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尤其是特拉维夫地区的定居,为以色列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饮用水、农田等关乎生存发展的生产生活资料，犹太移民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升级，成为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面对上述局面，特拉维夫彻底脱离雅法的意愿不断增强，规划一座拥有独立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城市^[20]已经成为新城建设的当务之急。由于格迪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①抱有浓厚兴趣^[3]，加之其本人在城市规划领域享有的世界声誉，受特拉维夫首任市长迪森高夫（Meir Dizengoff）的盛情邀请，格迪斯于1925年对特拉维夫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实地调查，并历时5个月编制完成了城市规划报告和城市规划方案。该成果于1926年获得地方议会批准，从而确保了规划方案的完整实施^[21]（图3）。时至今日，就特拉维夫城市规划史研究而言，格迪斯方案已经成为一条不可回避的关键性线索。

2 格迪斯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创新

结合规划内容分析，格迪斯方案之所以能够成为特拉维夫建市初期第一个也是唯一通过官方批准的城市规划方案^[22]，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中全面涉及了区域研究与城市定位、地块划分与总体布局、道路规划与街区管控等不同层次的规划内容。对于一座希望独立发展的希伯来新城而言，这样一份相对完整的城市规划方案正是特拉维夫所需要的。



图3 格迪斯方案（左）与规划区现状（右）

资料来源：左图源自参考文献[21]，右图源自2024年谷歌卫星地图

2.1 区域研究与城市定位

在进入城市规划领域之前，作为生物学家的格迪斯曾长期致力于藻类细胞与宿主动物之间的共生关系研究。而在职业生涯转向城市规划领域之后，这样的学术经历和专业视角为他思考城市问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认识基础。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将新兴的物种进化理论带入特拉维夫，为格迪斯结合区域环境审视城市定位问题提供了启发。他认为，如同自然界的物种进化和共生规律一样，城市也处在持续性的进化发展过程之中，区域环境、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等各项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决定城市生长变化的主要动力，应该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基础。与此同时，从当时的城市化特征判断城市发展趋势，格迪斯认为城市规划应该将城市与乡村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建立一种全新的区域规划概念。对于以上两点认识，从格迪斯赋予特拉维夫的城市特性——巴勒斯坦城市与农业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和连接枢纽——能够看到，其中明显蕴含了区域规划视野下的城市有机生长理念。对于当时的城市规划领域而言，这样的理解方式可谓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认识。

其次，格迪斯认为，犹太人重建家园的民族理想与田园城市理念之间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和匹配度^[23]。他指出，特拉维夫应当延续自定居点建设之初就已经具备的田园城市特征并尽可能完善这一特征。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特拉维夫应该成为田园城市建设的行动先驱。由此可见，格迪斯不仅能够敏感捕捉犹太移民的核心诉求，而且能够将其与当时新兴的城市规划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洞察力和文化理解力也是格迪斯方案优势凸显的关键所在。

在区域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统筹思考方面，格迪斯方案之所以表现得尤为突出，其背后隐藏的深意是融会贯通了生物学、社会学的思维范式，格迪斯建立了城市规划的3S（综合[synthesis]、和谐[sumpathy]、协同[synergy]）基本原则，为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理解自然、社会、城市三大基本要素的交互关系提供了焕然一新的思想启发（图4）。作为职业生涯临终之际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说特拉维夫是格迪斯城市规划思想的一次自我检验与总结。

2.2 地块划分与总体布局

在地块利用和城市布局方面，对个人土地财产、居民住房保障和城市规划可实施性的多边关系思考是格迪斯方案的独到之处。发挥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和住房建设的主体引导

①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宗教思想、民族精神相互交织和共同作用，集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价值取向于一体的持久性民族运动。就以色列而言，复国运动的实现路径首先是犹太移民在雅法等城市周边大规模购买土地，发展起特拉维夫等中心城市，进而扩张形成一个犹太国家。在此过程中，复国运动对以色列的城市发展乃至国家命运走向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深远影响。

作用，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了格迪斯考虑城市形态和空间布局问题的总体思路。

在土地财产权方面，格迪斯强调，个人土地所有权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位城市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的思想意识为制定土地分配方案确定了总体基调。在住房方面，格迪斯更是将居住保障上升到社会道德的高度，并明确指出为特拉维夫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不仅要以解决住房问题为根本基础，而且应该通过与居民进行平等对话和民主谈判的形式确定土地划分标准。

基于以上两项基本原则，格迪斯采用了均等分配居住用地的城市规划决策。由此，每个社区定居点成为嵌入城市整体结构中的细胞单元，特拉维夫得以形成一种自由、匀质、非等级的城市空间体系。与当时流行的分区规划方法相比，格迪斯方案并没有过多针对工业、商业等功能分区概念进行城市总体布局，而是主要通过居住用地规划，将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意识嵌入城市规划方案，从而凸显了格迪斯面向本土问题的规划创造能力（图5）。

2.3 道路规划与街区管控

除了以上两个层次的规划内容，格迪斯还采用了一种结构明确的城市道路布局模式，即统筹考虑已有建设基础与区域交通关系，将特拉维夫的道路系统划分为林荫大道、主干道、社区街道和林荫小道4个等级^[24]。与此同时，格迪斯利用道路系统将整座城划分为若干规模相近的居住街区，为之配备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从今天的视角看，将道路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公共设施规划紧密结合起来，也为推动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朝向综合性、系统性的方向发展作出了示范。

此外，格迪斯以居住街区为基本单元制定规划设计标准，依托居住街区塑造城市形态，引导建筑设计，凸显了城市规

划对土地利用、建筑设计的协同管控作用。在土地利用方面，格迪斯制定了街区规模、道路尺度、居住用地面积等一系列建设规范；在建筑设计方面，格迪斯对居民住宅的间距、形态、层数、高度等内容也做了详细规定。上述规范共同塑造的连续性城市景观风貌，为百年之后特拉维夫白城入选世界遗产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图6）。



图5 特拉维夫1925年已有用地分界（左）与格迪斯规划的土地利用方案（右）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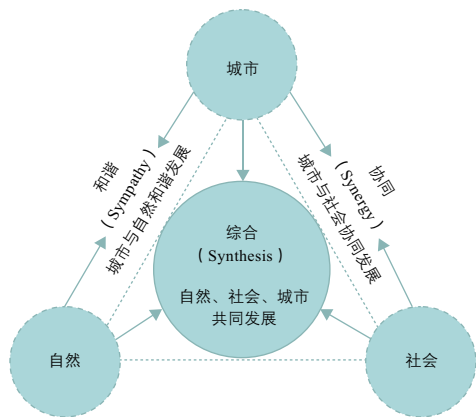


图4 格迪斯的城市规划3S基本原则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6 世界遗产特拉维夫白城的空间肌理

资料来源：<https://www.veer.com/photo/308951448.html>

3 格迪斯方案独特内涵分析

正如格迪斯所认为的,特拉维夫是在地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意识、公民精神、地缘文化的独特个性展现。本文希望进一步探讨的是,在特定的区域历史环境下^[25],格迪斯方案体现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地方主义思想与早期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交叉互动,为规划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延展性思考空间。

3.1 现代城市规划的特殊人文内涵

尽管与当时新兴的早期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运动在总体特征上保持了一致性,但不可否认,格迪斯方案是适应以色列特殊政治环境的城市规划产物。如果将国际社会承认特拉维夫的城市身份作为以色列建国的最初起点,那么在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全球化语境背后,格迪斯方案还承载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城市规划领域的特殊贡献。

1918—1925年间,格迪斯曾3次到访巴勒斯坦地区,其主要任务就是为英国授权的托管政府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工作^①。在此期间,他已经提出了按照田园城市的流行范式为犹太移民安置新家园的初步思路。且从中能够看出,格迪斯想象的特拉维夫早期雏形,从一开始就反映了民族意识形态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的思想基础。

按照格迪斯的设想,希伯来文明拥有强大的精神领导力和行动号召力,犹太移民要想寻求在巴勒斯坦地区永久定居的解决方案^[26],只有通过城市规划承接民族意识形态^[27],利用空间秩序彰显民族文化优越性^[28],才能建起一座代表希伯来文明的现代城市,从而让新移民获得家园归属感。这样的意识形态进一步表明格迪斯的城市规划思想充满了民族性内涵。由此可见,将民族理想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富有人文精神的城市规划思想为民族主义的繁荣生长提供了文化力量,对以色列的城市发展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29]。

3.2 新移民定居点的现实考量

20世纪初,建国前的以色列总体上呈现两条主要发展路径:一是在雅法郊外持续开发建设新的城市定居点;二是依托基布兹(Kibbutz)^②和莫沙夫(Moshav)^③模式大力推进农业区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协商与分批次购买的基础上,

特拉维夫新城采用的是“买一块、造一块”的建设方式。从这种实际情况看,在特拉维夫,英国那种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方法既不适用也不利于具体建设工作的开展与实施^[30]。对此,格迪斯认为应该尊重并顺应特拉维夫特有的城市建设方式,将犹太移民的自主性建设行动与城市规划方案相结合。

作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因素,格迪斯最终确立了以定居点为基础、以定居者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基本原则(图7)。今天看来,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城市规划思路将特拉维夫塑造为定居点的自然延伸产物,由此避免了现代城市规划的一大弊病——千篇一律、高度雷同的国际化倾向。这种特殊背景也证明了在特拉维夫,社会群体与城市规划息息相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强而有力的共生关系^[31]。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格迪斯认为任何城市的进化发展都唯有通过融入具体空间关系的社会结构才能实现^[32]。早在20世纪初,他就表现出了尊重社会现实、利用社会结构的城市规划意愿和空间建构逻辑。颇为遗憾的是,虽然城市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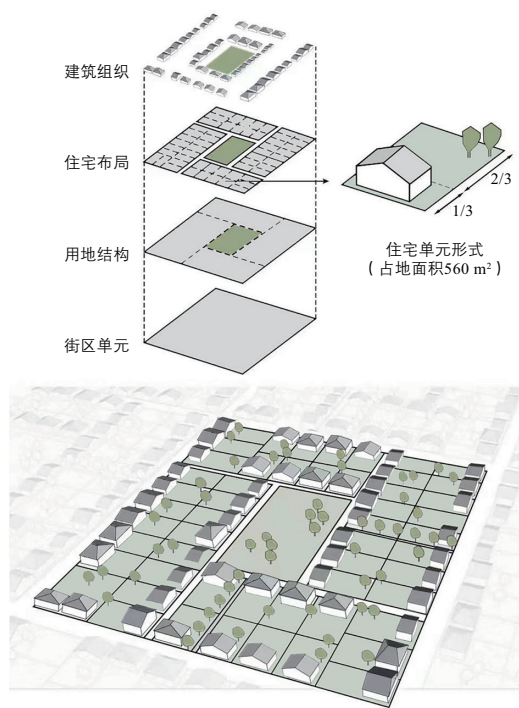


图7 特拉维夫早期犹太人定居点土地利用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4]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获得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权,该地区成为英属托管地(British Mandate)。在英国政府准许下,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进驻巴勒斯坦并建立各种政府职能机构,推动该地区的犹太移民数量稳步增长,其中特拉维夫是犹太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② 基布兹模式是由犹太移民在犹太国民基金会资助之下发展起来的,以农业合作生产为基础的定居模式。基布兹模式是以色列犹太复国运动的集体行动表现,作为特殊的时代产物,基布兹模式具有集体主义、公有制和市场化等主要特点,带有朴素社会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性质与内涵。

③ 莫沙夫模式产生年代稍晚于基布兹模式,也是以色列早期犹太移民创建的一种劳动合作型社区。与高度集体主义的基布兹模式不同,在生产、生活、财产等各个方面,莫沙夫模式的组织形式更灵活,内部成员的自主权更大,其影响力也因此后来居上,成为以色列最主要的一种社区组织模式。

划方案得到了完整实施,但随着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城市阶层分化持续加剧,格迪斯倡导的社区人口混合居住等后续发展构想未能进一步实现,在空间形式背后,特拉维夫最终形成了与格迪斯原始初衷大为不同的社会形态结构。

3.3 特拉维夫与雅法的城市关系分析

就区域层面而言,与母城雅法的历史演变关系是探讨特拉维夫城市规划绕不开的一个专业话题。格迪斯本人曾表示,特拉维夫的任何发展都应该从“大雅法”的利益出发^[33]。对此,在提交给市政府的规划报告中,格迪斯在开篇就特别解释到:“特拉维夫作为新城市的地理区位、社会结构甚至经济形势都取决于其在雅法北部的地位”^[34]。然而,笔者认为,格迪斯方案的关注焦点很明显是特拉维夫内部的空间功能组织关系,应当说,对特拉维夫与雅法的城市关系考虑不足,的确是格迪斯方案的疏漏之一。

当然,从根源上讲,雅法与特拉维夫的分离源自英国和以色列对两座城市定位达成的一致性共识。一方面,之所以对两座城市采取分治决策,主要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是以安全防卫为目标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沦为雅法的附庸,英国托管政府和新市民都寄希望于通过城市规划方案将特拉维夫与雅法完全区分开来,以便在空间和种族等各个方面进行人口差异化管理^[35]。

将特拉维夫与雅法割裂开来对待,形成了政治实体之间的战略分界线^[36],由此带来显而易见的负面结果,对后续都市区发展以及城市遗产保护等许多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例如:尽管特拉维夫已经成为完整保护城市遗产的杰出典范^[37],然而为了突出其自身的独立代表性,历史古城雅法并未被共同列入世界遗产保护范围。在很大程度上,特拉维夫与雅法的二分法思维实质上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缘政治关系的一种具体反映,但无论如何,强调自我定义的现代性,忽略了雅法的客观存在是格迪斯方案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几乎同一时间,在地中海对岸,以完整保护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城市遗产资源为前提,法国规划师普罗斯特(Henri Prost)为摩洛哥制定了新首都拉巴特的城市规划方案。今天,拉巴特已经成为一项历史古城与现代城市共同分享的世界遗产^[38]。将二者进行横向比较,格迪斯方案突出体现了城市规划对土地开发与新城建设的积极回应^[39],面对拥有数千年文明积淀的历史古城雅法,格迪斯的确没有对城市遗产保护表现出时代“敏感性”。

在格迪斯方案实施后期,特拉维夫于1934年彻底脱离雅法成为一座独立城市(彼时格迪斯已去世两年)^[40]。然而历史早已证明,特拉维夫独立设市没有阻碍雅法与之共同发展。得益于门户型港口城市的优越交通条件,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雅法都是海外移民进入特拉维夫的主要登陆地^[41]。1948年,雅法的城市规模已经比格迪斯时代扩大了10倍之巨^[42],紧密的同城化效应推动两座城市很快走向一种融合共生的发展状态。1949年,两市合并成立新的特拉维夫-雅法市。在此后历年编制的城市规划方案中,二者在各个方面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今天的特拉维夫与雅法之间,格迪斯方案当年的规划范围已经成为城市行政版图图中的很小一部分区域(图8)。

4 结语与启示

近年来,特拉维夫的许多城市问题被归咎于格迪斯当年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的确,这座城市已经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甚至与格迪斯最初的规划设想背道而驰。但是,任何城市规划实践都难免受制于时代局限性,特别是以色列建国前,特拉维夫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雅法郊区转变为一座新兴城市^[43],面对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作出精准的预见性判断无疑极其困难。不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整个国家的战略中心,特拉维夫的发展方向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城市规划问题,而是自始至终都受到巴以地区风云变幻的时局动态以及许多不可抗力的客观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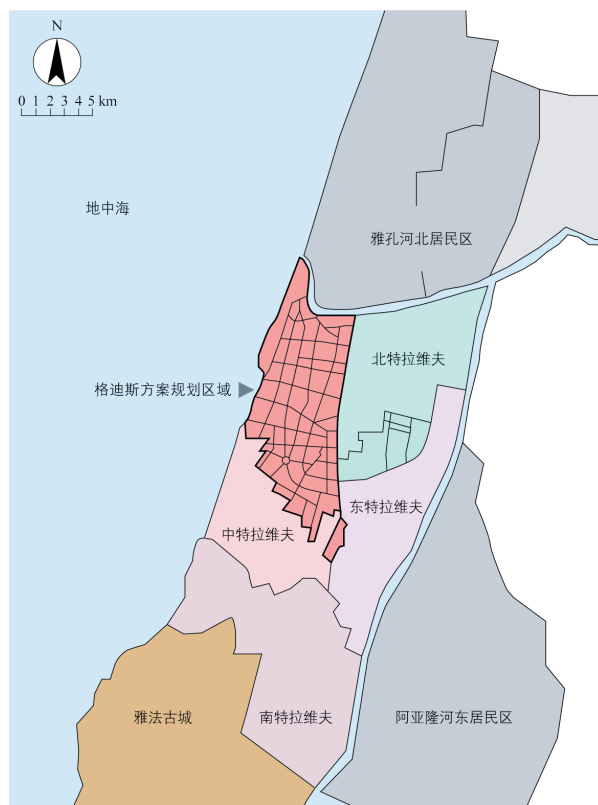


图8 格迪斯方案规划区与雅法古城的空间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4]

本文研究了格迪斯方案的历史背景、规划内容及其独特内涵,重点结合特定的地方环境和地缘背景,综合分析了格迪斯方案得以被采用的主要缘由。研究认为,格迪斯方案不仅充分反映了特拉维夫的地方性身份认同特征,而且为塑造这些特征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证明,将城市规划作为实现途径,同时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意识形态偏好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建设诉求^[44],格迪斯促进了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在特拉维夫的时空交汇,从而形塑了特拉维夫城市规划的历史特性,为今天的规划师、规划学者思考城市规划如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满足、适应地方身份认同提供了学习借鉴的重要线索^[45]。

回顾总结历史贡献,格迪斯为特拉维夫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集中体现了如下两重关系。第一是延续历史——将城市规划作为犹太移民追求独立建城理想的实现途径,格迪斯不仅继承了早期定居点建设的历史基础,而且进一步将更丰富的民族精神融入城市规划方案,为特拉维夫注入了更丰厚的人文内涵。第二是创新探索——在综合思考城市规划各项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纳入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层次的规划内容,对特拉维夫城市规划方案的整体性把握,将格迪斯引领时代之先的城市规划轮廓托举出历史的水面,使得早期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基本逻辑结构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与格迪斯方案相同的是,所有的城市规划实践,本质上都是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与之不同的是,古往今来,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裂缝往往很难弥合,从而导致许多城市规划思想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早在20世纪初,将延续历史和开拓创新作为城市规划的共同原点,格迪斯在特拉维夫城市规划方案中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事实上,不论在任何国家以及任何时代,赓续历史与守正创新都应该是城市规划必须坚守的两大根本原则。吸收格迪斯城市规划思想的精髓要义,对城市规划的本质内涵进行重新发现并予以确认,这不仅是本文获得的有益启示,也是规划史研究的价值所在。UPI

参考文献

- [1] AMIT-COHEN I. Synergy between urban planning, con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built heritage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the old urban center-the case of Tel Aviv[J]. Land use policy, 2005, 22(4): 291-300.
- [2] SOKER-SCHWAGER H. A place in history: modernism, Tel Aviv, and the creation of Jewish urban space (review)[J]. Hebrew studies, 2008(49): 376-379.
- [3] RUBIN N H. The celebration, condemn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Geddes Plan, 1925: the dynamic planning history of Tel Aviv[J]. Urban history, 2013(1): 114-135.
- [4] ALLWEIL Y, ZEMER N. Housing-based urban planning? Sir Patrick Geddes' modern masterplan for Tel Aviv, 1925[J]. Urban planning, 2019, 4(3): 167-185.
- [5] MILNER E L. Devaluation, erasure and replacement: urban frontier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settler colonial urbanism in Tel Aviv[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20(2): 267-286.
- [6] 金经元. 帕特里克·格迪斯的一生——把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融汇在城市规划之中[J]. 城市发展研究, 1996(3): 24-28.
- [7] 帕特里克·格迪斯. 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M]. 李浩, 吴骏莲, 叶冬青, 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 [8] 凯瑟琳·维尔·罗尚. 特拉维夫百年建城史[M]. 王骏, 张向荣, 张照, 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
- [9] 雅荣·佩雷格. 如何建造犹太国——19世纪80年代至1948年间巴勒斯坦犹太空间的构建[J]. 世界历史评论, 2020(1): 3-36, 230.
- [10] 王继然. 特拉维夫城市规划史(1909—2002)[D]. 太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
- [11] 艾仁贵. 建造“第一座希伯来城市”——“田园城市”理念与特拉维夫的城市规划(1909—1934)[J]. 史林, 2021(2): 169-182, 222.
- [12] UNESCO. White City of Tel-Aviv-the modern movement[R]. Paris: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03.
- [13] PAYTON N I.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city: Patrick Geddes' plan for Tel Aviv[J]. Planning perspectives, 1995(10): 359-381.
- [14] ALFASI N. A tale of two cities: Jerusalem and Tel Aviv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J]. Cities, 2005(5): 351-363.
- [15] KATZ Y. Ideology and urban development: Zionism and the origins of Tel-Aviv, 1906-1914[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986(4): 402-424.
- [16] LEVINE M. Conquest through town planning: the case of Tel Aviv, 1921-48[J].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98(4): 36-52.
- [17] HELMAN A. "Even the dogs in the street bark in Hebrew": national ideology and everyday culture in Tel-Aviv[J].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2022(3/4): 359-382.
- [18] SHADAR H, MASLOVSKI E. Pre-war design, post-war Sovereignty: four plans for one city in Israel/Palestine[J].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2021(4): 516-540.
- [19] HYMAN B. British planners in Palestine, 1918-1936[D].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94.
- [20] AZARYAHU M. Tel Aviv: center, periphery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an aspiring metropolis[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3): 303-318.
- [21] NISKANEN A. The white city-Tel Aviv's modern movement[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JSAH, 2014(4): 582-588.
- [22] BIGER G. A Scotsman in the first Hebrew City: Patrick Geddes and the 1926 town plan for Tel Aviv[J].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992(1): 4-8.
- [23] TIAN H, LI M, DING Y, et al. Ideal construction and adaptation: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idyllic urban planning in Tel Aviv[J/OL].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024-09-26[2024-10-11]. <http://doi.org/10.1080/13467581.2024.2399733>.
- [24] WELTER V M. The 1925 master plan for Tel-Aviv by Patrick Geddes[J]. Israel studies, 2009(3): 94-119.
- [25] MAROM N. Planning as a principle of vision and division: a Bourdieusian view of Tel Aviv's urban development, 1920s-1950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4(8): 1908-1926.
- [26] NATHAN H.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Zionist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rlin and Tel Aviv[M].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7] LESHEM N. Repopulating the emptiness: a spatial critique of ruination in Israel/Palestin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3, 31(3): 522-537.
- [28] LLOYD D.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of exception: the example of Palestine/Israel[J].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2012(1/2): 59-80.
- [29] MUALAM N. Geddes resurrected: the legacy of Sir Patrick Geddes in 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in Tel Aviv[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10): 57-70.
- [30] ALFASI N. Planning policy? between long-term planning and zoning

(下转 95 页)

tcs2011_chin.pdf.

- [49] 2022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EB/OL]. (2022-07-01)[2022-12-08]. <https://huiyan.baidu.com/cms/reports/landing?id=124&role=traffic>.
- [50] WANG F, CHEN W, ZHAO Y, et al. Adaptively exploring population mobility patterns in flow visualiz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2017, 18(8): 2250-2259.
- [51] ZHONG T, LÜ G, ZHONG X, et al. Measuring human-scale living convenience through multi-sourced urban data and a geodesign approach: buildings as analytical units[J]. Sustainability,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 2020, 12(11): 4712.
- [52] ZHAO P, LÜ B, ROO G DE. Impact of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on urban commuting in Beij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era[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1, 19(1): 59-69.
- [53] 张灵珠, 晴安蓝, 崔敏榆, 等. 立体化超高密度亚热带城市的老年群体休憩用地使用偏好研究 [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5(1): 36-46. DOI: 10.19830/j.upi.2019.672.
- [54] 叶宇, 黄榕, 张灵珠. 多源数据与深度学习支持下的人本城市设计: 以上海苏州河两岸城市绿道规划研究为例 [J]. 风景园林, 2021, 28(1): 39-45.
- [55] ITDP. 行人有限创建步行友好城市工具书 [EB/OL]. (2019-01-01)[2022-12-08]. <https://www.itdp.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Pedestrians-first-chinese-2019-01-1.pdf>.
- [56] COOPER C H V, CHIARADIA A J F. sDNA: 3-d spatial network analysis for GIS, CAD, Command Line & Python[J/OL]. SoftwareX, 2020, 12[2023-07-18]. [https://www.softxjournal.com/article/S2352-7110\(19\)30340-1/fulltext](https://www.softxjournal.com/article/S2352-7110(19)30340-1/fulltext).
- [57] 郎魁, 克里斯托弗·约翰·韦伯斯特. 紧凑下的活力城市: 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在香港的解读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3): 28-33. DOI: 10.22217/upi.2017.131.
- [58] 张灵珠, 晴安蓝, 崔敏榆, 等. 间隙之间: 基于三维可达性的“纳凉网络”设计研究 [J]. 风景园林, 2022, 29(6): 109-114.
- [59] DE BLASIO M B. Cool Neighborhoods NYC[EB/OL]. (2017-01-01)[2022-12-12]. https://www1.nyc.gov/assets/ort/pdf/Cool_Neighborhoods_NYC_Report.pdf.
- [60] Apur. Cool Air Itineraries and Islands in Paris[EB/OL]. (2018-07-06)[2022-12-12]. <https://www.apur.org/en/our-works/cool-air-itineraries-and-islands-paris>.
- [61]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 [62] 任春洋. 美国公共交通导向发展模式 (TOD) 的理论发展脉络分析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4): 92-99.

(本文编辑: 高淑敏)

(上接 83 页)

- amendments in the Israeli planning syste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6(3): 553-568.
- [31] YACOBI H, TZFADIA E. Neo-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re-formation of territory: privat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in Israel[J]. Mediterranean politics, 2019(1): 1-19.
- [32] LAW A. The ghost of Patrick Geddes: civics as applied sociology[J].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05(2): 1-14.
- [33] LEVINE M. Globalization,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in a colonial city: the case of Jaffa and Tel Aviv[J].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7(2): 171-198.
- [34] LEVINE M. Re-imagining the “White City” 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 designation in Tel Aviv/Jaffa[J].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2004(2): 221-228.
- [35] GORDON N. From colonization to separation: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Israel’s occupation[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4(1): 25-44.
- [36] ALEKSANDROWICZ O. The camouflage of war: planned destruction in Jaffa and Tel Aviv, 1948[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17(2): 175-198.
- [37] ALFASI N, FABIAN R. Preserving urban heritage from old Jaffa to modern Tel-Aviv[J]. Israel studies, 2009(3): 137-156.
- [38] 王祝根, 李百浩. 规划遗产: 拉巴特世界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认知思考 [J]. 城市规划, 2023(8): 47-56.
- [39] KALLUS R. Patrick Gedd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 housing type in Tel-Aviv[J]. Planning perspectives, 1997(12): 281-320.
- [40] AZARYAHU M, GOLAN A. Contested beachscapes: planning and debating Tel Aviv’s seashore in the 1930s[J]. Urban history, 2007(2): 278-295.
- [41] KIPNIS B A. Tel Aviv, Israel-a world city in evolution: urban development at a dead end of the global economy[J]. Dela, 2004(21): 183-193.
- [42] MULLER R C. Jaffa -Le Port De Jerusalem Au XIX e Siecle[J]. Les Cahiers Du Judaïsme, 2000: HAL Id: hal-04058450.
- [43] INGERSOLL R. Pilgrimage to the White City: international style conference at Tel Aviv[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1995(4): 268-270.
- [44] ROZENHOLC C. The neighborhood of Florentin: a window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Tel-Aviv[J].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analysis, 2010(2): 81-95.
- [45] FENSTER T, YACOBI H. Whose city is it? on urban planning and local knowledge in globalizing Tel Aviv-Jaffa[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05(2): 191-211.

(本文编辑: 王枫)